

专题：聚焦中美关系

大战略互动中的美中关系

[美] 埃德温·温克勒

内容提要：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如何将其目标、能力以及所处环境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指导思想。美中两国对各自大战略的表述风格迥异，其内涵差异更大。美国的大战略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它的基本前提是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美国的战略传统包括五大原则，最重要的一条是阻止能成为美国对手的大国崛起。中国具有独特的战略特性，一直声明把和平发展作为大战略的主题，其大战略要捍卫的三大利益是政治安全、国家主权和自身的经济发展。根据美中两国大战略的互动可以判断，未来几十年的美中关系很可能是其路艰难，重大机遇与重大问题并存。

关键词：大战略 美中关系 竞争性大国 核心利益

导言 战略对比与影响评估

在讨论美中关系时，人们往往喜欢直接从双边关系开始谈起：介绍两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或者谈谈双边关系中的独特模式与重大问题。然而，美中关系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围绕更宏大的目标也存在互动，这一点在表述两国的全球“大战略”（grand strategy）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基于大战略考虑，美中双边关系将走

1 [美] 埃德温·温克勒（Edwin A. Winckler）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政治研究。

向何方？¹

本文将对两国的大战略进行对比，随后评估这些战略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正文的第一部分将指出美国与中国的一些基本战略特性。第二部分概述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部分概述中国的基本战略并讨论其对美国可能产生的影响。结论部分将指出：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和扩展既有分析。

当然，在不考虑相关情境的情况下，简单描述一些全球战略的原则，并据此引申出对实际关系的暗示，这种做法过于简化。需要考虑的情境不仅包括两国所处的地区与世界环境，还包括两国的国内政治与经济，乃至国家决策程序本身。幸运的是，已经有相当丰富的中英文文献将中美关系置于上述各种驱动力下进行讨论。然而，讨论两国大战略间互动的文献则相对较少。²

自始至终，“大战略”指的是一个国家如何将其目标、能力以及所处环境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指导思想。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全球大战略：维持在美洲的主导地位，同时避免其他大国主导西欧或东亚。自1949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战略主要聚焦于地区层面，关注国家自身以及近邻：维持国家政权稳定，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同时寻求经济发展。³

在地区层面，目前美国和中国都在调整各自的亚洲战略，二者交汇于一片广袤的地区，该地区横跨欧亚大陆，同时涵盖印度洋和太平洋。其他亚洲国家选择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和与美国的安全关系间进行“对冲”。美国仍未能使其“美国领导者”的全球战略充分适应于亚洲当前独特的地区生态：亚洲国家即使想要美国的军事保护，仍不想全然接受美国的领导。而中国则尚未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可以在该地区“崛起”的同时而不使其邻国因恐惧缔结对抗性联盟，包

¹ 作为背景阅读，关于美中关系，参见 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Aaron L.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New York NY: Norton, 2011;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O’ Hanlon,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关于美国政策，参见 Jeffrey A. Bader, *Obama and China’s ris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2。关于中国政策，参见 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2015; David M. Lampton, *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关于战略，参见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Edward Luttwak, *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为避免重复，其他的杰出研究直接在下文中引用，不再一一列举。

² 关于驱动力的研究，参见 David Shambaugh, ed., *Tangled Tita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

³ 关于美国战略，参加 Hal Brands, *What Good is Grand Strate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关于中国的全球化，参见 David L.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括与美国结盟。¹

在双边层面情况亦然，当前美中两国都正在调整应对彼此的战略。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两国都尚未形成清晰的战略。这种情况十分危险，因为它们既不知道对方可能如何行事，甚至也不清楚自己当如何行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在与中国接触时就没有充分贯彻其全球战略：美国并没有阻止潜在对手的崛起，而是选择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未来，当中国已经能成为一个“战略竞争者”时，美国对华政策将更为贴近其全球大战略。²

描述一国大战略时，多数人会关注政治领导人的公开声明，或者关注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分析。本文将尽可能的援引外交政策操持者实际使用的表述。这些外交实务的表述比政治人物的辩论少了一些党派色彩，同时也不像学者的分析那样充满理论性。

因此，在描述美国后冷战时期大战略时，笔者会从2012年范彼得（Peter Feaver）写的一篇概要开始。范彼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美国学者，参与了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决策。而关于中国近年来的大战略，我们则从王缉思2011年的一篇文章入手。王缉思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并与中国的决策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随后，我们会讨论双方到2014年为止战略的延续性与变化，着重强调奥巴马政府和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所面对的困难和进行的调整。³

一、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特性

关于美国和中国的战略特性，本文首先对两国的国家特性进行分别讨论，然后再进行相互比较。最后，将指出两国在表述战略与关系时的差异。⁴

1 Van Jackson, “Local Flavor: What Asia’s Hedging Trend Tells Us about Asia, and Strategy,” January 5, 2015, www.warontherocks.com/2015/01/local-flavor-what-asias-hedging-trend-tells-us-about-asia-and-strategy/, 2015-03-20; Ellen L. Frost, *Rival Regionalisms and Regional Order*, Seattle WA: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February 10, 2015, nbr.org.

2 Christopher Ford, “Ending the Strategic Holiday,” *Asia Policy*, Vol. 18, July 2014, pp. 181-189, www nbr.org/publications/element.aspx?id=753, 2015-03-20; 也可见 Christopher Ford, “The Death of the ‘Liberal Myth’ in U.S. China Policy,” November 20, 2014, www.newparadigmsforum.com/NPFTestsuite/?p=1896, 2015-03-20。关于美国战略调整的中文分析，可见许嘉、陈志瑞编：《取舍：美国战略调整与霸权护持》，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3 美国方面，参见 Peter Feaver,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t the Crossroads,” in Richard Fontaine and Kristin M. Lord, eds., *America’s Path*,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2, pp. 57-70。中国方面，参见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ch-April 2011, pp. 68-79。

4 许多特性在下书中被提到：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一) 国家特性

就其本身来看，美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战略特性。

从1820年代开始，美国就已经成为美洲独一无二的地区性大国。

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且有许多盟友。

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已经形成相当清晰的全球大战略。

从1940年代开始，美国对某些海外地区缺乏清晰的战略。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美国开始调整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欧亚大陆的地区性战略。

中国同样具有独特的战略特性。

中国一直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区域性对手环伺，却缺乏盟友。

中国尚未成为全球性大国，缺少海外盟友。

中国仍将地区性战略视为重中之重。

然而，从2000年左右开始，中国逐渐开始“走向全球”。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中国开始逐步调整其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的步伐。

美中两国都存在一些令人遗憾的战略特性。两国都认为他们是“特别的”：比其他国家更重要，且道德上更优越。同时，两国对于自己的真实国家认同都存在一些冲突性的观点。这些内在的冲突极大地影响了双方对彼此的看法，结果是无法实事求是地评估对方。美中两国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些不透明和自以为是，且固守自己真正的核心目标决不妥协。美中对于自身对别国（无论大小）的影响力都缺乏足够的敏感性。这些缺陷并不怎么令人惊讶，因为几乎所有的人类群体，尤其是大国，都有这些问题。¹

(二) 共同特性

对于美中两国来说，近年来国内主要的战略争论都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展开：

从总体态势上看，美国正在从进取向收缩转移，而中国正在从收缩向进取过渡。

在追求当前核心目标的道路上应该选择进取还是收缩（Do More or Do Less）的战略。从总体态势上看，美国正在从进取向收缩转移，而中国正在从收缩向进取过渡。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衰退而中国正在崛起，毋宁说这不过是两国都在努力调整本国战略使其更为有效。在两国国内，关于进取还是收缩的争论正逐渐演变为是否应当改变大战略的

¹ 关于对美国战略的批评，可见 Andrew J. Bacevich,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NY: Holt, 2009; Richard K. Betts, *American Force*, New York N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1。关于对中国战略的批评，参见 David L. Shambaugh, “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4, No. 1, Winter 2011, pp.1-27; Christopher A. Ford, *China Looks at the West*, Louisville 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5。

讨论。¹

在美国，主张进取战略的一派（主要是共和党人）认为需要用积极的对外政策维持美国的安全。主张收缩的一派（主要是民主党人）则认为过于积极的外交政策在国外和国内都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在中国，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应该“韬光养晦”推动经济发展，还是应该利用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资源“奋发有为”。²

大多数关于大战略的讨论假定其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外部的战略问题：一国应如何应对看起来客观的外部环境。然而，对美中两国来说，大战略同样要解决内部战略问题：掌权的政治精英如何能够维持大众支持。在国家层面，不论国内外，大战略同样反映出精英势力之间的竞争以及精英决策进程本身的能动性。³

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上述各个层面的问题都愈来愈复杂，且三个层面有相互交叉融合的趋势。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美中两国都各自加强了国内的政策协调。然而，双方仍呈现出多重政策倾向，例如在美国，政界和军界之间以及两党之间的政策差异。两国领导人对彼此国内存在的决策问题均有所了解，但相较而言，美国的决策过程比中国的更为透明。⁴

在讨论美中关系时，往往会强调两国相对权力的变化以及彼此带给对方的威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从根本上说，美中关系不需要这么困难。美中两国本土相距甚远，很难给对方的生存带来致命威胁，它们的核立场也不倾向于这么做。美中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且经济上的竞争保持在正常范围内。尽管官方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但是两国人民对对方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均有好感。⁵

当然，两国的利益分歧也在不断增加。事实证明，诸如台湾和贸易这样的老问题比较好处理，而像中国的海洋诉求等其他常规性问题就较难解决。某些涉及

1 关于美国的战略调整，参见 Peter Feaver, ed., *Strategic Retrenchment and Renewal i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14。关于中国的战略调整，参见 Chen Dingding and Wang Jianwei , “Lying Low No Mor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9, No. 2, September 2011, pp. 195-216。

2 关于美国的收缩战略，参见 Barry Posen, *Restrai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关于中国的进取战略，参见 Yan Xuetong,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2, Summer 2014, pp. 153-184。

3 Peter Trubowitz, *Politics and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4 关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决策，参见 Gabriel Marcella, ed., *Affairs of State*,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7/2014。关于中方，参见 Johannes Feige, “How Well Does China Control its Military?” November 14, 2014, www.thediplomat.com/2014/11/how-well-does-china-control-its-military/, 2015-03-20。

5 但是两国的核关系可能恶化，参见 Ellbridge Colby, “Welcome to China and America’s Nuclear Nightmare,” December 19, 2014, www.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elcome-china-americas-nuclear-nightmare-11891, 2015-03-20。

非传统性威胁的问题，如核、太空、网络等问题也不易处理。¹

然而，两国的共同利益也在增加：诸如维持全球经济增长，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甚至为海洋安全制定相应的政策等。美中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是通过对于某些特殊问题的具体合作实现的，尤其是当这些重要的全球问题只有美中两国协作才能解决时。不幸的是，两国在表述问题以及推动磋商方式方面的差异阻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²

(三) 不同的战略表述

美中两国在大战略表述上风格迥异，至少从公开表述方面看是如此。双方都会陈述主要原则，并界定主要利益。然而，美方在正式表述利益时更加务实，强调实际的目的与方法，较少意识形态铺陈。例如，对美国国防状况的阶段性审查或对新贸易协定的建议等。与之相反，中国在表述大战略时常以表明原则和界定关系开篇。在澄清国家利益时，往往措辞隐晦，缺乏细节阐述，这一点在国防计划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两国在描述双边关系时同样存在差异。³

安全：美中两国都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问题。但是美国更希望详细讨论特定的安全问题，而毫无疑问中国在某些问题上并不想这么做。

经济：美中两国都主张发展经济。但是双方都更偏爱自己主导的发展进程，如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意识形态：美中两国都持有强烈的理念。相较来看，中方喜欢宣告支配国家间关系的一般原则，而美方更偏好澄清针对具体问题的详细解决办法。

对于美中双方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对方所宣称的战略是否只是一种蓄

¹ 关于双边关系的调查，参见 Susan V. Lawrence, *U.S.-China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3。关于传统问题前景的稳定性，台湾问题参见 Richard C. Bush, *Uncharted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贸易问题参见 C. Fred Bergsten, Gary Clyde Hufbauer, and Sean Miner, *Bridging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2014。关于传统问题中的不稳定因素，中日美关系，参见 Richard C. Bush, *The Perils of Proxim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3。关于中国东海问题，参见 James Manicom, *Bridging Troubled Water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4。关于中国南海问题，参见 Bill Hayton, *The South China Sea*,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关于非传统的不稳定问题，参见 David C. Gompert and Philip C. Saunders, *The Paradox of Power*,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2; Robert Haddick, *Fire on the Wate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4。

² 关于原则与利益，参见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Need to Pursue Mutual Interests in U.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1; Richard H. Solomon, *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Stephen Hadley and Paul Haenle, “The catch-22 in U.S.-Chinese Relations,” 22 February, 2015,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3167/stephen-hadley-and-paul-haenle/the-catch-22-in-us-chinese-relations, 2015-03-20。

³ 关于美中对话，参见 Nina Hachigian, ed., *Debating China*,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意的战略欺骗（“战略猜疑”）。历史上，美国很少进行战略欺骗，因此当一些中方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当前的对华战略具有欺骗性时，大多数美国专家感到十分沮丧。而历史上，中国的战略理论十分推崇迷惑对手这一战略手段，尤其是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近来，一些美国分析家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的大战略就开始迷惑美国，使其相信中国仍处于落后、需要援助的状态，并将在未来继续保持和平态势，直到中国发展到足够强大，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¹

对于美中双方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对方所宣称的战略是否只是一种蓄意的战略欺骗（“战略猜疑”）。

二、美国的大战略与中国的反应

这一节主要讨论美国的大战略、中国的反应以及其对美中关系的启示。引言部分将概述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的全球战略。随后的部分首先将陈述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大战略信条，然后讨论近几任政府贯彻大战略信条的延续性与变化，最后将指出当前美国战略所面对的主要困难。

引言

美国的领导地位是现代美国大战略的基本前提：美国必须在全球保持绝对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在世界的几个主要地区。这对美国来说不难实现，因为在其本土所在地区（首先是北美，其次也包括南美地区）不存在势均力敌的对手。因此，美国可以将其注意力延伸到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地区，主要是西欧和东亚。原则上，美国可以选择简单地阻止任何潜在对手成为这些地区的霸主（“离岸制衡”），也可以尝试自己主导这些地区（“域外霸权”）。²

美国的领导地位是现代美国大战略的基本前提：美国必须在全球保持绝对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在世界的几个主要地区。

事实上，一些非主流的批评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已经在警告美国不要仅仅寻求战后全球优势地位，而是要努力成为“域外霸权”，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美洲以外的地区重新产生威胁美国安全的力量。因此，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前提要先于苏联的威胁产生，更不必说来自中国的威胁了。根据这种非主流观点，二战之初萌发的基本前提持续的塑造着此后的美国战略，既包括冷战时期，也涵盖当今的中美关系。一些非主流批评者敦促美国应该以如下方式适

¹ 关于降低战略猜疑，参见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Jisi Wang,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2。关于战略猜疑日渐上升，参见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New York NY: Henry Holt, 2015。

² 关于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参见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应中国的崛起：在亚太地区由“域外”霸权战略向离岸制衡战略收缩。但是即便是离岸制衡也仍要预防中国主导亚洲。¹

关于当今美国战略的主流阐释开始于冷战时期，当时美国秉持“遏制”苏联的总体大战略，且最后取得了胜利。积极的遏制战略阻碍了苏联的发展，不只是军事领域的发展，同时还包括经济层面（“预防性”遏制）。然而，遏制战略是复杂的。几种相抗衡的政策趋势竞争不断：传统的孤立主义、新兴的遏制政策以及所谓的“抵消”苏联权力。不同的政策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各占上风。非主流的分析家强调美国始终比苏联更为强大，与主流的“两极说”观点相左。²

苏美之间的历史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许多中国人感觉美国正在从军事上和经济上“遏制”中国。美国对此的回应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没有用冷战经典意义上的“预防”政策来遏制中国。美国实际上一直在促进中国发展经济和参与国际社会。如果有所谓的“遏制”中国崛起的努力，那不过是试图促使中国融入现有的国际规则（practices），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规则（“包容性”遏制）。³

在地缘政治领域，美国内再一次产生了政策倾向之间的争论。右翼人士开始后悔美国曾帮助中国“崛起”，同时建议美国采取其他措施保护自己应对中国崛起。立场中立的主流安全分析家能够接受中国的崛起，但是认为美国应保留其当前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以“劝阻”中国从事任何军事冒险行为。只有一少部分左翼人士认为应允许中国逐渐主导其周边地区。⁴

关于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些专家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战略，或者至少说这一战略未能取得成功。本文认为美国确实已有一个总体上的大战略，即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且，总的来说，至少到现在为止，这一战略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维持美国的全球优势方面还是相当成功的。然而，与非主流的批评观点相适应，本文补充认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大战略“遗产”在某些方面适得其反。因为它使得美国的盟友过于依赖美国的权力（肆意“跟庄”），另一方面还促使其他国家试图对抗美国的权力（软“制衡”）。⁵

美国两党和大多数分析家认为，美国战略传统取得的成功多于其副作用。只有一小部分非主流人士——左右翼均有——持相反观点，因而认为美国应该转而

1 关于美国为何要接受中国的崛起，参见 Donald Gross, *The China Fallacy*, London UK: Bloomsbury, 2012。

2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 David Shambaugh, ed., *Tangled Tita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 53-73.

4 关于美中安全动态，参见 Adam P. Liff and G. John Ikenberry, “Racing Toward Traged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2, Fall 2014, pp. 52-91。

5 Peter Feaver, “8 Myths about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November 23, 2011 www.foreignpolicy.com/2011/11/23/8-myths-about-american-grand-strategy/, 2015-03-20.

采取相对来说不那么有诉求的大战略。迄今为止只有一小部分不属于共和、民主两党的政治人士开始考虑替代选项。对大众来说，许多美国人承认无法理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战略是如何在具体案例中贯彻的。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还是无法同意，或至少不愿承认，美国领导地位战略本身取得事与愿违的效果。美国人厌倦了在国外进行战争，但是他们仍希望当出现新问题时美国能做出有力的应对。¹

(一) 美国的战略传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不久，时任布什政府和随后的克林顿政府就已开始构想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领导地位。其基本理念在于：既然美国已不再受苏联钳制，因此应该将其领导地位从“自由世界”向全球扩展，不仅涵盖军事领域，还应获得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到小布什政府末期时，美国的战略传统主要包含以下五条主要原则。每一条对美中关系都有一定的启示。²

(1) 从长远来看，阻止**竞争性大国**（Rival Power）的崛起，诱使上升中的国家与美国合作，如果后者不配合则对其采取限制性措施。因为中国是美国当前最重要的潜在对手，如果中国拒绝与美国合作，或者试图对当前国际体系进行剧烈变革，那么这一原则将为中美关系带来巨大问题。

(2) 从短期看，识别并应对**重大威胁**。其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重大威胁来源之一，原本以核和化学武器的形式存在，现在网络空间和太空也被涵盖在内。而中国在后两个领域内发展迅速，因此这一战略原则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领域，中美两国在原则上能够达成共识，因而很可能得以在实践中解决分歧。

(3) 通过**民主化**，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逐渐向美国靠拢。这一点不仅便于美国行事，同时理论上也能使其他国家受益。而**人权**则是作为民主化的附带原则存在。很显然，中国强烈抵制西方版本的“民主化”和“人权”概念。不过，美国已经不再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4) 通过**市场化**，以美国为蓝本逐渐重塑世界。同样，理论上这一原则也有益于其他国家，能够带来繁荣。从大概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已运用这一原则对待中国，帮助后者发展经济。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并且对进一步的国际市场化表示欢迎。然而，中国要求改革（全球）治理，并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机构。

(5) 从2001年起，美国开始极力抵御**跨国恐怖主义**的威胁，尤其是伊斯兰

1 Pew Research Center, “As New Dangers Loom, More Think the U.S. Does ‘Too Little’ to Solve World Problems”, www.people-press.org/2014/08/28/as-new-dangers-loom-more-think-the-u-s-does-too-little-to-solve-world-problems/, August 28, 2014.

2 Peter Feaver,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t the Crossroads,” in Richard Fontaine and Kristin M. Lord, eds., *America’s Path*,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2, pp. 57-70.

好战分子发起的恐怖主义。中国同样反对以部分穆斯林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尽管其威胁主要来自于新疆地区而非国外。一些人对中国国内维吾尔族可能受到的待遇表示担忧，但是美国无法阻止中国打击其所界定的恐怖主义。

显而易见，第一条原则——阻止竞争性大国的崛起——对美国最为重要，同时也会为美中关系带来最多问题。美国可以接纳新兴大国的崛起，前提是后者拥护和平繁荣的国际秩序，哪怕双方对这一秩序有不同的理解。但是，美国不会接纳一个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新兴大国，也不会接受一个想要支配西欧或东亚的新兴力量。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对华战略的基调一直是：鼓励中国发展经济和外交，同时通过维持在西太平洋的强大军事存在“劝阻”中国军队进行军事“冒险”。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初强调对华的鼓励政策，但随后亦加重了“劝阻”的成分。下一任美国政府很可能进一步加强对华“劝阻”力度，尤其是如果共和党能够当选的话。¹

（二）延续性与变化

战略进取与收缩的分析有助于分辨历任美国政府大战略的延续与变化。总体上看，政府的战略与当前两党的立场相符，共和党政府（小布什）倾向于进取，民主党政府（克林顿和奥巴马）倾向于收缩。

在1993—2001年克林顿政府任内，其收缩战略表现为在军事介入海外地区时，仅采用空中力量而不派遣地面部队。2001—2008年小布什执政期间战略上更为进取，小布什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地面战争，尽管不论是从在海外动武角度看还是从获得国内支持的角度看，这两场战争均遭失败。2009—2014年奥巴马执政期间试图通过施加限制与削减开支从而实现战略收缩。可以说，奥巴马此举是为了减少美国领导地位带来的副作用。然而不幸的是，奥巴马的战略极简主义（strategic minimalism）同样未能在军事和大众支持度方面取得成功，至少从短期来看是如此。²

在2015—2016年间，共和党将促使奥巴马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以及中国等特定地区采取更为进取的军事政策。但是很可能奥巴马会继续在军事上维持收缩态势，偏重采取更为长远的、地区的外交手段。然而，收缩并不

¹ 关于美国将如何应对中国的讨论，参见Thomas J. Christensen,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2, No. 3, June 2009, pp. 89-104; Ashley Tellis, *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4。

² 关于美国当前政策，参见Richard Weitz, “Obama Administration Reaffirms China Policy in Key Documents,” February 16, 2015, www.hudson.org/research/11047-obama-administration-reaffirms-china-policy-in-key-documents, 2015-03-20;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C: whitehouse.gov, 2015。

意味着无为。只不过是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优先使用外交而非军事手段，动用空中力量而非地面部队，使用无人机而非有人驾驶的飞行器。同时，这也代表着加强经济外交，尤其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¹

通常认为，中国会乐见美国采取收缩战略而非进取战略。然而，事实上中国很可能更倾向于欢迎美国采取进取战略，如果这种战略加速美国衰落的话。无论如何，不管美国采取何种战略，中国都会对美国的大多数做法进行强力抨击。总的来说，如果美国采取收缩态势，将更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建设性发展，因为当美国战略上更为进取时往往会妨碍中美合作的进行。²

对于大战略原则的逐条分析同样有助于理解战略的延续性与变化。从延续方面看，冷战后的历届政府都努力应对潜在的竞争性大国，同时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即时威胁采取有力回应。从变化方面看，克林顿政府试图增加两个新理念——应对失败国家以及促进多边主义——尽管这未能取得成功。后来的布什政府并未延续这两点理念，而奥巴马则做出如下调整。

部分基于防止出现竞争性大国的原则，奥巴马确立了亚洲再平衡这个次原则，尽管中国并不欢迎，但是共和党政府很可能会继续延续这一战略。

奥巴马不喜欢将反恐作为压倒性战略原则，但是恐怖主义在国外卷土重来迫使他不得不继续予以打击。此举延缓但并未阻止其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对此很难喜闻乐见。

除了在条件已经成熟的那些国家之外，奥巴马在推动民主化方面表现得比较低调。他很可能不希望将国际秩序限定于“民主”国家内部，因为这会将中国排除在外。

奥巴马追求实现全球市场化的努力受到了民主党人士的拖累，但是在2015—2016年间，共和党很可能对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的经济范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表示支持。中国不欢迎这一协定，因为它被排除在协定之外。

奥巴马重申了克林顿有关失败国家的理念，并冠之以更普遍的失序之名，此举在中东地区尤为显著，在那里国家的失败已经超越了国界。中国不愿见到美国干涉中东，但同时它应该也不希望中东处于无序状态。

奥巴马延续了克林顿对多边主义的推崇，试图将大战略任务转嫁给其盟友（“推诿责任”）。中国对美国进一步奉行多边主义表示欢迎，但不希望此举会强化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日本。

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试图将阻止气候变化确立为新的战略原则，如果共和

1 关于削减开支，参见Peter Trubowitz, *Politics and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43。

2 关于对美国政策的五点强烈批评，参加《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1月25—29日文章。

党继任，很可能弃之不顾。中国赞成采取措施控制气候变化，但是希望这一工作更多的由发达国家来承担。

其他非传统关切，如确保能源安全以及公共卫生，很可能最终成为美国战略新的组成元素。想来中国应该不会反对，甚至给予支持。

（三）当前美国面对的困难

到2014年为止，奥巴马的战略遭遇到一系列困境。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范彼得在杜克大学的同事）对此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归纳。可以预测，中国对美国面临的这些困难将持欢迎态度。¹

美国应该对外采取战略克制，但是这种审慎态度无法获得国内的政治支持。可想而知，不论是美国实施克制战略，还是其无法获得国内对使用武力的支持，中国都将对此表示欢迎。

美国必须平衡预算开支，但是财政紧缩会妨碍美国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当欣闻美国领导地位受到局限。

奥巴马的战略假定欧洲是安全的，但是俄罗斯近来表现出的强硬立场再一次引起美国人的注意。显然中国欣赏普京的坚定性，并欢迎他对美国发起挑战。

美国需要从阿富汗和伊拉克解脱出来，但是又不能留下当前的烂摊子一走了之。中国当然希望美国的资源因此而分散。美国则鼓励中国在阿富汗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国必须缩减财政开支（Retrench），但过度紧缩支出很可能会破坏稳定的国际局势。一般认为，中国欢迎美国减少财政赤字，但不希望此举带来严重的全球动荡。

上述任何一条困境本身都是一个难题，所有这些难题交织在一起足以带来灾难。中国应该乐见美国遇到某些困难，甚至是遭遇全盘的战略灾难。

小 结

对于未来美国的战略，中国所能期许的最好情况是，美国逐渐从“前沿存在”向某种增强版本的“离岸制衡”收缩。囿于美国资源的局限性，事实上这种转型很可能已经在进行中了。美国向离岸制衡方向收缩会使中国感到满意吗？很可能不会，因为美国的战略目标仍是维持其在地区以及全球的领导地位，而此举必然要阻止中国支配欧亚和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此外，美国很可能仍将保留打击中国国内武器系统的能力，作为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保护其离岸军事设施

¹ Hall Brands, “Breaking Down Obama’s Grand Strategy,” June 23, 2014, www.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reaking-down-obamas-grand-strategy-10719, 2015-03-20.

的手段。¹

三、中国的大战略与美国的反应

本章将概述中国的大战略，美国对此可能的反应以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启示。引言部分将简要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的战略演变。第一节首先将指出在其战略“传统”指导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对于核心利益的表述。第二节将考察中国的战略在21世纪头十年的延续与变化。最后一节将指出中国当前战略中的若干难点。

引言

如果说美国长期以其全球领导地位作为大战略主题，那么中国一直声明将和平发展作为其大战略主题。众所周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不断强调“和平”原则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中国视和平为其发展的先决条件。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力不断强大，中国仍不断重申其发展是和平的。²

从1949年开始，中国先后采纳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大战略：起初是一边倒向苏联共同抗美，然后是独自抗衡美苏两方，接下来是联美抗苏，最后逐渐重申其独立自主的主张。近来，中国重新调整了国家战略，将注意力从大国向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和战略盟友（尤其是金砖国家）转移。³

因此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中国积极倡议在交通物流与外交方面对亚欧大陆进行整合，明确中国在亚欧大陆的定位。这可以被看作是通过进取战略维护中国长远利益的举措。然而，量变（少做变为多做）会带来质变（从双边向地区，从西进向东进，以及从海洋向大陆转移），而质变会为中国此前宣布的战略目标与原则增加新的内涵。⁴

如果说美国长期以其全球领导地位作为大战略主题，那么中国一直声明将和平发展作为其大战略主题。

¹ 关于将亚洲看作一个地区的不同看法，参见 Steve Chan, *Looking for Bal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² 关于中国冷战后国家战略，参见 Jia Qingguo, “Learning to Live with the Hegem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4, No. 44, August 2005, pp. 395-407; Barry Buzan, “The Logic and Contradictions of ‘Peaceful Rise/Development’ as China’s Grand Strateg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No. 4, Winter 2014, pp. 381-420。

³ 参见 Robert G. Sutter,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RC*,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3。

⁴ 关于中国战略向欧亚大陆转移，参见王缉思：《西进》，《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7日；Yun Sun, “March West: China’s Response to the U.S. Rebalancing,” January 31, 2013 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1/31-china-us-sun, 2015-03-20。

(一) 中国战略传统

和美国的战略一样，中国战略也包括几点主要原则。21世纪头十年，中国宣布必须维护（safeguard）三类国家利益：¹

政权安全（尤其是防止外国颠覆）。从1917年开始，这一点就是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之中的共产党政权的主要关切。不过，美国现在不再积极试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其民主化战略遭遇中国共产党政权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得比较克制。

对外主权（防止外来侵犯）。这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关切，对于那些曾经遭受过外来侵略的国家来说尤甚。然而，美国无意侵犯中国。台湾问题不过是美国沿袭始于冷战时期的领导者责任的遗留产物。

内部发展（要通过外部稳定来实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就成为中国的重要目标，美国通过贯彻其市场化战略积极予以帮助。目前，中国对国家间的自由市场表示欢迎，但是想通过其自己的贸易集团实现这一目标。

关于上述三方面利益，2006年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外事工作会议和2014年第二次外事工作会议上均有正式表述。毫无疑问，这些是中国大战略的重要原则。遗憾的是，囿于措辞隐晦，很难清楚理解这些利益的具体内涵。尤其是无法分辨哪些利益是核心利益，因而无转寰余地。²

在公开场合，中国最为强调对外主权，而其中台湾、西藏和新疆又是重中之重。很明显这意味着，尽管常强调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中国保留在上述核心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使用武力捍卫这些利益的权利。而在私下场合，可以推测中国共产党更为关注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在国家主权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良好表现都是更好地为了这一目标服务。显而易见的是，不论中国是否将其列为“核心”利益，在政权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都不会做出让步。

在原则上与实践中，美国都力图使中国在上述各核心利益领域感到安心。以上几点中，只有政权安全原则与美国的民主化原则存在抵触。但是，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并未试图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或者挑战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奥巴马也一再强调，美国将持续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主权问题上，奥巴马公开重申其在2014年11月与习近平在北京进行的谈话：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中国”（One

1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ch-April 2011, pp. 68-79.

2 关于新华社对于2006年胡锦涛讲话的报道，参见“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胡锦涛作重要讲话”，2006年8月23日，新华网。关于2006年会议的分析，参见 Bonnie Glaser, “Ensuring the ‘Go Abroad’ Policy Serves China’s Domestic Priorities,” *China Brief*, Vol. 7, No. 5, May 9, 2007, www.jamestown.org/single/?no_cache=1&tx_ttnews%5Btt_news%5D=4038#.VPdjA_nF9WU, 2015-03-20。关于之后2014年的会议，参见 Timothy Heath, “China Overhauls Diplomacy to Consolidate Regional Leadership, Outline Strategy for Superpower Ascent,” *China Brief*, Vol. 14, No. 24, December 2014, www.jamestown.org/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43216&cHash=60479b6085735414b7361aaa5d32287#.VPdjc_nF9WU, 2015-03-20。

China) 的组成部分，西藏（更不用说新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¹

然而，中国的“核心利益”概念为中美关系带来一些问题。首先，美国担心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会正式将其他特定利益界定为“核心”利益（如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岛屿归属）。其次，美国无法接受中国将所有核心利益都视为不可谈判、没有转寰余地的议题。最后，对于中国提出的“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美国表示很难接受。因此，美国已经不再使用这一中国的表述方式。²

（二）延续性与变化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战略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对美国的依赖度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从整体上看，中国在后冷战时期大战略主要原则的累进性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大战略的发展并未因领导人的变更发生重大变化：胡锦涛时期逐渐向进取战略演进，而习近平继任后延续了这一战略。在胡锦涛和习近平时期，在进取和收缩之间都曾进行过调整。即便习近平时期表现出新一轮的积极性特征，但是其战略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数代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这表现为尊重前几任政府思想的表述和当前未被采纳的观点。³

习近平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时期的审慎，同时试图减少胡锦涛执政后期由于军事上的自信带来的生硬之感。然而，习近平继承并进一步强化了胡锦涛时期在外交领域的积极作为，这在与其他国家双边往来和参与重要多边会议方面表现得都很明显。此外，在思想体系上，相对于邓小平时期，习近平领导集体做出进一步超越，指出战略环境的变化要求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立场。中方是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这一新战略的。习近平的讲话概述了“新时期”——

¹ Press Offic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November 12,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11/12/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joint-press-conference>, 2015-03-20.

² 关于美国抵制中方的口号，参见 Andrew S. Erickson and Adam P. Liff, “Not-So-Empty-Talk,” October 9, 2014,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2178/andrew-s-erickson-and-adam-p-liff/not-so-empty-talk, 2015-03-20; Li Cheng and Lucy Xu, “Chinese Enthusiasm and American Cynicism over the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December 4, 2014, 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4/12/05-chinese-pessimism-american-cynicism-great-power-li-xu, 2015-03-20。关于中文分析文章，参见王缉思主编：《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³ 关于变化，参见 David M. Finkelstein, “Commentary on China’s External Grand Strategy,” 38th Taiwan-U.S.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uly 14, 2009。关于延续性，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7, No. 4, Spring 2013, pp. 7-48; M. Taylor Fravel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ese Signaling in the East China Sea?” April 12, 2014, 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monkey-cage/wp/2014/04/12/chinese-signaling-in-the-east-china-sea/, 2015-03-20;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ti-foreigner propaganda is not spiking in China,” December 2, 2014, 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monkey-cage/wp/2014/12/02/anti-foreigner-propaganda-is-not-spiking-in-china/, 2015-03-20。

很可能是习近平接下来执政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¹

根据新华社摘要，习近平的讲话首先指出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总体目标。然后回顾了当前中国外交成就，包括新兴大国关系以及与周边邻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讲话还简述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比较短期困难与长远的积极发展趋势。讲话随后界定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外交的主要特征与目标。从整体而言，这次会议既体现了更为自信的外交政策理念，同时也重申继续保持审慎的必要性。²

（三）当前中国面临的困难

当前中国的新战略不再像以往那样强调大国关系的重要性，这有助于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中国的新战略（这个战略早在2013年的一次会议上就已经初露端倪）强调要重视与周边亚洲国家以及新兴国家伙伴的关系，此举会加剧与美国之间的间接竞争。由这一战略激发的中国外交在2014年的活跃表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中国当前的大战略仍蕴含了一些内在问题。这里将根据不同层面、领域和时期一一进行列举（王缉思教授在其2011年发表于《外交事务》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就已指出其中重要的几点）。³

在不同结构层面，中国对外主权、政权安全和内部发展三方面目标可能存在相互冲突，因而中国无法形成单一的总体大战略。维持民众对政权的拥护要求维持经济发展，但是发展需要更进一步融入国际秩序，而这反过来会对政权稳定带来威胁。同样，为了维持大众的支持，政权必须在对外主权方面采取民族主义姿态，这也会影响到内部发展。

在不同层面内部也各自存在困难。从跨国层面来看，尽管外交上频频主动出击，中国的对外目标始终面临战略猜疑和外部抵制，其中尤以美国为甚。从国家层面来看，尽管已经加大力度强化组织与进程，中国外交政策的协调性仍有待提高，这使美国感到忧虑。从次国家层面，政治精英对大众民族主义感到担心，而媒体仍在不断地进行煽动——尽管更多的是针对日本而非美国。

从不同的功能领域来看，安全有时会妨碍经济发展（限制交流）并损害认同（损害“软实力”）。在安全领域，中国正试图构建区域联盟，但是其所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内涵尚待进一步明确。在经济领域，中国与新兴的金砖国家也存在一些冲突，但是后者正是其想联合起来共同抗衡发达西方

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解读中国外交新理念》，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宫力、王红续：《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

² 参见“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Xi Jinping Attends Central Foreign Affairs Work Conference, Delivers Important Address”，xinhuanet.com, November 30, 2014。

³ 关于2013年周边工作会议，参见Bonnie Glaser and Deep Pal, “China’s Periphery Diplomacy Initiative,” csis.org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November, 7, 2013。

世界的对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不断突显其官方国家理念，但是善治和创造性社会才是软实力最重要的力量源泉。

从时间跨度来看，中国在时机选择上面临重大挑战：何时在短期、中期和长远目标间转换。短期目标容易受到突发危机以及美国多变的国内政治的影响。在中期目标方面，习近平政府会努力维持“和平与发展”。用更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中美关系仍然处于过渡期，在未来几十年间无法保持稳定。

小 结

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都十分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究竟是一个愿意接受既有国际秩序的维持现状的国家，还是一个想要推翻这一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可以说，目前中国在两方面均有所体现。同时，中国也在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通过联合其他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在参与现有国际机制的同时建立其他的制度。这种间接竞争的方法可能会减少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直接冲突。

在地区范围内，习近平政府调整了战略优先性，将重心由大国关系转向周边国家，这同样有助于避免中美双方的直接冲突。这种调整与中国对未来长期地缘政治趋势的判断相一致，这一趋势将使得亚洲逐渐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对于美国而言，在整个亚洲范围内，中国的重心偏移很可能会带来风险，加剧间接竞争。

结论 改善和扩展分析

本文的主要分析论点在于：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需要对两国总体大战略进行简明扼要的对比，同时对这些表面上的战略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中美互动进行评估。既有的中英文文献十分丰富，但是缺乏对两国大战略互动的精妙讨论。

本文仅仅勾勒出这一方法的大致框架，在至少三方面需要进一步的批评与完善。首先，需要对两国大战略进行进一步的对比。其次，需要进一步评估两国表述的战略对美中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舞台上实际互动的影响。最后，需要检验两国目前究竟是在简单地调整既有战略，还是正在向新战略转型。

对于每个国家来说，提出自己的全球大战略都是颇有裨益的，它可以促使该国明晰自身的诉求。国家可能会为本国的战略思考感到困惑，只有在具体实施中才能发现真正的战略。国家公布的大战略很可能无法具体地指导国家行为。或者说，有时国家所宣称的大战略只不过是形同虚设，意在战略欺骗。本文的着重点是大战略的目标，但是实现大战略的能力更值得关注。

对比中美两国的全球大战略有助于人们识别中美双边关系中潜在的利益交汇点和冲突点。如果中美双方在处理双边

对比美中两国的
全球大战略有助于人
们识别美中双边关系
中潜在的利益交汇点
和冲突点。

关系时都致力于实现全部大战略目标，那么双边关系中的利益交汇和冲突点就都会十分明显。共同利益不可能自动地消弭冲突，因而双方需要继续积极地经营双边关系。

评估双方提出的战略对实际行为的影响可以发现：选择进取还是收缩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变量——美中两国在追求更宏大目标的过程中，选择以何种方式和强度对待对方。在某种程度上，两国的政策活跃程度将同步变化。然而，需要进一步分析当中国日益进取时，美国要如何才能实现战略收缩，同时不以牺牲彼此的安全为代价。

追溯两国战略中的延续性与变化，有助于人们思考双方战略变化的程度与性质。美中两国仅仅只是在战略遗产（进取战略或收缩战略）的框架下从量上调整既有的大战略吗？还是说双方已经开始向截然不同的战略方向转型，实现质的变化？人们可以争论说，美中两国在以上两方面均有所体现。

美国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再平衡”（调整）不可避免的涉及从“前沿存在”向“离岸制衡”（转型）收缩。中国试图前瞻性地塑造其战略环境（调整），不论成败与否，这都将反过来影响中国的区域和全球战略（转型）。

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将来美国很可能不再试图阻止中国经济乃至军事的进一步崛起。但是美国**将要**通过重整军备以及调动其亚洲盟友的方式抵消中国军事崛起的影响。中国很可能**不会**直接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但是，中国**将会**间接且持续的试图削弱、改革、规避以及取代现有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¹

根据美中两国大战略的互动可以判断，未来几十年的美中关系很可能是其路艰难，重大机遇与重大问题并存。美中两国间可能会发生危机，但是鉴于双方都在测试并且了解对方的极限，危机还是有望可控的。两国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低，因为这对双方来说都将是一场重大灾难。然而，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双方绝不可能兵戎相见。这种可能性要求美中两国严肃地关注这个问题，以便努力避免战争。²

(年玥 译；徐彤武 校)

1 关于未来美中关系的不同观点，参见 Henry Kissinger, “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1, No. 2, March-April 2012, pp. 44-55; Avery Goldstein, “China’s Real and Present Danger,”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3, pp. 136-144; Amitai Etzioni, “Mutually Assured Restraint: A New Approach for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20, No. 11, Spring/Summer 2014, pp. 37-51; Chas Freeman, “China as a Great Power,” Remarks to China Renaissance Capital Investors, Macau, November 7, 2014; Christopher K. Johnston, Scott Kennedy, and Bonnie S. Glaser, “How to Pragmatically Respond to Greater Chinese Activism On the Global Stage,” February 13, 2015, www.csis.org/publication/thoughts-chairman-how-pragmatically-respond-greater-chinese-activism-global-stage, 2015-03-20。

2 Christopher Coker, *The Improbable Wa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